

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

——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

杨迪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

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

——总参参事室的历史回眸

孙 建

总参参事室编著

杨 迪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/杨迪著 .—北京：解放军出版社，2002

ISBN 7-5065-4380-X

I . 抗… II . 杨… III .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—史料—1937～1945 IV . E29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2798 号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35)

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3.75

字数：345 千字 印数：1—8000 册

定价：28.00 元



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（右）、副主席周恩来（左）、朱德（中）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。



1941年叶剑英
参谋长在延安。



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的宝塔山和延河水。



1943年叶剑英同志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纺线。



1944年7月在王家坪桃园。左：龙桂林，中：安东处长，右：作者（第一次照相）。

此照片是当时延安首席摄影师吴印咸同志所摄，他是我党摄影的元老，建国以后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。



1944年作者所获奖章。



前排右座：一局伍修权局长，左座：边章五局长。后排左：一局安东处长，右：作者。
(摄于1946年春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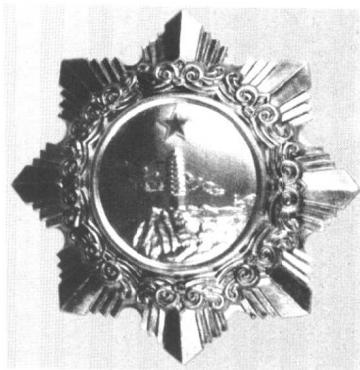
1946年，叶剑英同志与美国代表饶伯森（中）、国民党代表郑介民（右）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。



1946年作者（左）与李树槐卫士长（右）等在北平叶公馆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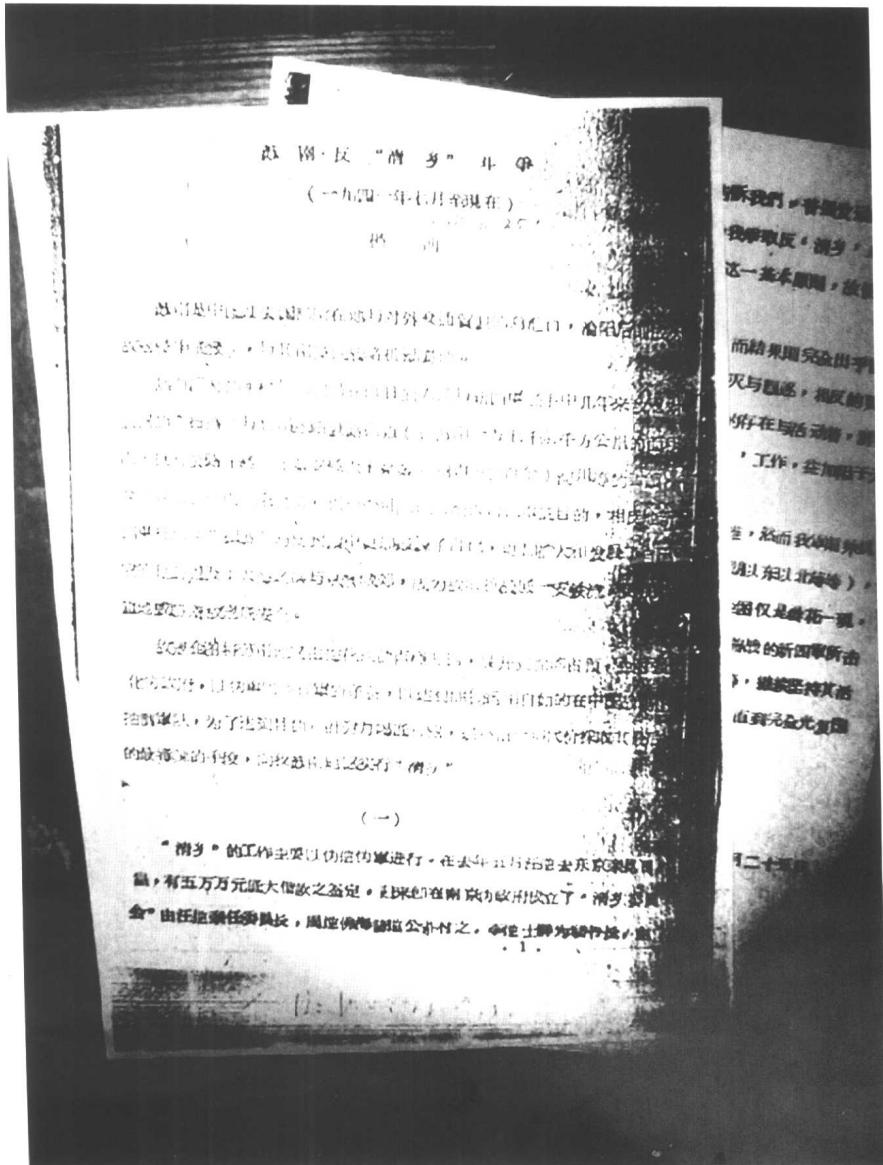
1938年12月部队在行军途中休息时，一位同学给作者的剪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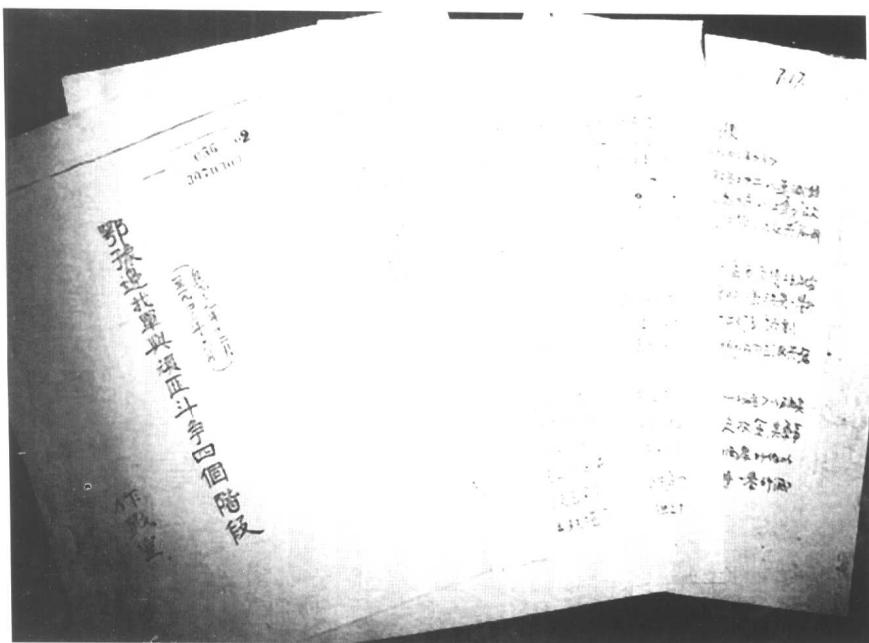
1955年，国家颁发给作者的三级“独立自由勋章”。



1987年，作者与夫人刘刚回延安，在作者1942年至1945年在王家坪住的窑洞前合影。



1942年6月25日，作者在总参作战局起草的《苏南反“清乡”斗争》情况。（此件是总参作战部编写部史的同志采访时，给作者的复印件）



1943年3月作者在总参作战局草拟的《鄂豫边我军与顽匪斗争四个阶段》情况报告。（此件是总参作战部编写部史的同志采访时，给作者留下的复印件）

卷首语

欣逢新千年、新世纪伊始的历史时刻，我拿起笔来写 20 世纪三、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所经历的历史史实时，我的心又回到 60 多年前的青少年时代。油然地哼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游击队之歌》……，回想起当时唱着这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激昂亢奋的歌曲，确确实实地起着动员、鼓舞全国人民奋起保卫国家，捍卫民族危亡，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来。也使我想起了古代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《建康之战》，那抗击金兵、收复失地的慷慨激昂的词赋（我少年时很崇拜岳飞）。

现在我先简单地说几句：当时总参谋部一局我是由见习情报参谋到正式的作战参谋，具体分管华中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方向。当时条件艰苦，上自局长，下到参谋都在一个大房间办公（即作战室），对华北八路军方向的情况，我也能听到；而且每个星期一上午，全局各方向参谋都要在一起向局长汇报一周情况；局长召集作战室的处长、科长研究问题时，都要有关方向参谋参加；同时，叶剑英参谋长常在作战室召开有关作战会议，听取汇报、研究作战问题，有关方向的作战参谋参加；还有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对有些重大的作战问题，有时也到作战室来研究，有关方向参谋也可以参加。等等。由于这些原因和条件，使我知道一部分全局的情况，我这里只是将我亲自参加做过的和亲耳听到，亲眼看到的一些历史实事真相写出来，我写的都只是从一个作战

参谋的角度所知道的。因此，我这本书定位在：一个作战参谋视角的历史回眸。

一种无法抑制的心情，驱使我这个现已近耄耋的幸存者，在生命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要把抗日战争时期我所知道的总参谋部工作写出来。一是，因为我军在红军时期，主要是进行游击战争，对司令部工作还是初创阶段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是我军逐步向正规化发展建设的时期，司令部工作越来越显出它的重要性和正规化的必要性。如何加强我军司令部工作建设，把司令部工作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和作用，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解决的。这个时期，继承了红军时期司令部工作的优良传统，又大力推进了司令部在新的条件下，向正规化方向的建设。二是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，都是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既要对日军、伪军（注：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军）作战，又要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（注：当时称顽军）的挑衅与进犯作战。延安也同样处在这样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我们在延安总参谋部是如何克服困难，战胜困难，艰苦奋斗，努力工作，为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的。三是，当时在艰苦环境下，同志们充满乐观主义的生活与同志间的亲密关系也很值得写出来，使之继承发扬。

写抗日战争的总参谋部工作本应该从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向我北平（注：即北京）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，激怒全体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开始写起。但前两年半的时间，我还没有进入总参谋部一局工作，因此，我只能从 1940 年初，我到一局工作后开始写。但有些事件，为了说明其来龙去脉，又必须要涉及到 1940 年以前的情况。

现在已进入 21 世纪，我军的发展与建设已今非昔比，已正进入正规化、现代化的高科技的革命化军队建设新阶段，对司令部工作与建设，完全不同于过去。但我认为我军及我军司令部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，现在仍然是可以作为借鉴的，仍然应该继

承和发扬的。所以我大胆地来写我军抗日战争时期司令部工作，也是出于这个纯朴的愿望。

我写此书的目的，是想将我经历的历史，如实地按当时的情况写出来，只写我亲自做的和耳闻目睹的第一手的真情实况。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，也应该是对没有参加过那段历史的后人负责。现在的读者，对作品的可读性要求很高，但很抱歉，我不可能用文学家的艺术语言生动地来描写，也不会用笔墨渲染。我只有用诚挚的感情，朴实的语言，真实的事，来打动读者的心灵，引起读者的兴趣与共鸣。

我已经写了一本《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》、一本《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》，（都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），都没有请人题写书名、题字、写序，而是请读者自己来评价，让历史去评说。我写这本书仍然是这个态度，仍然是这样做。

还有一点，我虽已年迈，但写每一本书，从来不请人代笔，我也没有学会用电脑打字，仍然是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地坚持写。这样，我慢慢地写着写着就能很自然地回忆起当时的历史情景，带着感情写出来，会更真实。

岁月如流水，弹指一挥间，60多年过去了，我真没有想到我能活到跨世纪。我回忆这段很不平凡的历史。很自然地怀念我崇敬的叶剑英总参谋长和伍修权局长等各位首长，是他们亲自将我这个青少年教导培养成为一名革命干部，我向叶总参谋长和伍局长等首长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深深的哀思。我还很怀念曾经帮助、教育我成长的一局各位领导、老大哥、老战友们，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怀念与衷心的敬意。

60年前，我在延安就反复读过苏联时期作家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，保尔·柯察金各个方面精神鼓励我的一生。我对书中保尔说的几句名言一直到现在还记在心里：“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，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”

今年（2002年）7月，当我写完这本书时，正是我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大举侵略中国的65周年纪念日（1937年7月7日）。我的心情特别沉重，思绪万千。我这个幸存者，仅以此书作为一份凝重的祭礼，奉献给参加抗日战争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们和死难的同胞们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|-------|--------|
| 卷首语 | | (1) |
| 第一章 延安王家坪，这个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| | (1) |
| 一、1939年我在延安“抗大”学习，因一个可笑 的小事情，胡耀邦同志认识了我，从而使我走 进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（作战局） | | (1) |
| 二、王家坪是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所在地，王家坪 又是军委、总参的代号名称。还有杨家岭、枣 园也是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| | (6) |
| 三、总参谋部组成的简要介绍 | | (9) |
| 四、住在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领导同 志，以及其他领导人 | | (12) |
| 第二章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，迫使日本改变了侵略 中国战略方针。一局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， 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党中央适时地制定了新 的战略方针 | | (15) |
| 一、略述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情况 | | (16) |
| 二、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，一局根据我军各战 略区情况的发展、变化，适时提出意见与建议 | | (25) |
| 三、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，我党中央、中 央军委适时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。我八路军、 新四军坚决贯彻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新的战略 部署 | | (29) |

— 1 —